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国粹与国学

许地山 著

所谓「国粹」必得在特别、久远、与美丽之上加上其他要素。我想来想去，只能假定说：一个民族的物质上、精神上与思想上对于人类，最少是本民族，有过重要的贡献，而这贡献是继续有功用，继续在发展底，才可以被称为国粹。



NLIC 2970696317

岳麓书社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国粹与国学

许地山 著



NLIC 2970696317

岳麓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粹与国学/许地山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 2011.1

(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80761-564-4

I. ①国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国学—研究—中国—民国—文集

IV. ①Z126.27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54163 号

国粹与国学

作 者: 许地山

责任编辑: 曾 倩 靳龙龙

封面设计: 肖睿子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 0731—88885616 (邮购)

邮编: 410006

网址: 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640×960 1/16

印张: 8.75

印数: 1—6,000

ISBN 978-7-80761-564-4/G·938

定价: 15.00 元

承印: 长沙鸿发印务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 0731-88884129

整理说明

一、丛书着力于“学术”与“文化”两方面，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，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。

二、丛书之收书范围，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，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。然某些著作之成形，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，因其有重要地位，亦酌情收入。

三、文、史、哲之分，原系西洋通则，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，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，而是根据整理进度，顺次出版。

四、丛书所收诸书，原版均为繁体竖排，在其流布过程中，亦有版本差异、文字错讹等现象，为方便读者，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：

1.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，竖排改为横排（原书中一般“右表”、“左表”、“右文”、“左文”均改为“上表”、“下表”、“上文”、“下文”），但为充分尊重原著，原书中专名（人名、地名、书名等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，凡底本脱、衍、讹、倒之处，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，皆一仍其旧。

2. 凡排印误刻者，如日曰、己巳巳、戊戌戌之类，均径改，不出

校记。

3.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，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。

4.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，原书以夹注出之，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，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。

5. 各书附“后记”一篇，说明著者爵里、版本流布、各界评论等情况，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。

古人云：“校书如扫落叶，旋扫旋生。”吾人虽勉力为之，而乖漏难免，还祈方家教正。

周 序

此刻的胸头觉得轻松些，带在身边的地山遗稿，已大部整理完竣。在遗稿《二十夜问》《危巢坠简》《杂感集》的写序时候，心中虽有万般伤痛，但总不及今天来为《国粹与国学》论文集写序的苦。为何？在我编理这本论文集时，其目次是依属分类，及完稿时间之先后为原则。本集里以《国粹与国学》为其最后一篇完成的遗著。当时在香港《大公报》上七月十五日开始连载。发表后，引起社会上一般的是非论。集中还有一篇《中国文字底将来》尚未结束，著者即于八月四日长辞世间，曾承港地新文字学会为纪念他而收编在《许地山语文论文集》内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为沉痛的纪念地山，不计书之内容如何，整理是否得当，乃以本名而冠书名。尚祈读者诸君鉴谅。

回忆当地山在世时，与流亡在港地诸文化人，大家是多么热忱的从事于抗日的工作，大众文化的工作；每日除了居家必定的时间与家人闲叙外，很少白费光阴。如今，敌人自认败北了，香港将复它的旧观，我们的社会文化新工作正多着，待人去耕耘，可是，地山只是被人记忆的

名字而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的工作者了！

无限的辛酸，何庸我多言。

侯松谨志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尾之战时生产局

目 录

CONTENTS

周 序	1
宗 教	1
原始的儒，儒家，与儒教	1
医学与道教	18
宗教底妇女观	24
文 物	38
大中磬刻文时代管见	38
清代文考制度	45
香港考古述略	67
礼俗与民生	71
猫 乘	74
语 文	96
中国文字底命运	96

青年节对青年讲话	101
拼音字和象形字的比较	106
国粹与国学	111
中国文字底将来	126
后 记	131

宗 教

原始的儒，儒家，与儒教

在原始社会中，凡长于一技，精于一艺底人，他必定为那群众所敬重。因为他能办群众所不能底事，所以他在那社会中底地位最高，且具有治人底能力。在草昧时代，人民最怕的是自然界一切的势力，疾风，迅雷，景星，庆云，乃至山崩，河决，无一不是他们所畏怖底。他们必要借着“前知”或“祈禳”底方法来豫防，或解救那一切的灾害。然而“前知”“祈禳”底事不是人人能办底，在一个团体中至多不过是三五个人而已。这样具超常人能力底人，必能制度，创物。这等人在中国古代，高明者为“圣人”，次者也不失为“君子”。但无论是圣人也罢，君子也罢，他们底地位即是巫祝，是宰官，或者也是君王。女娲炼石，神农尝药，蚩尤作雾，史皇（苍颉）制书等等，都是圣人能作物底；同时，他们是君主。史书多说蚩尤好乱喜兵，少说到他底好处，可是他也不定是很暴虐的人。他也是个儒者，《管子·五行》：“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；得大常而察于地利；得奢龙而辩于东方；得祝融而辩于南方；得大封而辩于西方；得后土而辩于北方。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，神

明至。”看来蚩尤还是一位助人君知天时底人哪。时代越下，依圣人曾经创作底事物而创作底人越多，“圣人”“君子”底尊号，当然不能像雨点一般，尽落在这些不发明而制物底人底头上，于是古人另给他们一个名字叫做“儒”。

“儒”这个字，《说文》解作“术士”。依这两个字底解释，是办事有方法底人底意思。（“术”《说文》解作“邑中道”，《广雅》解作“道”。“术”“道”相通，可见“术士”即是“道士”。）从制字底本义说，“儒”从人需，“需”《易·象》说是“云上于天”。《序卦》说是“饮食之道”。由说前是天地之道，而后说是人道，那就是说，儒是明三才之道底人。这个意思，汉朝的扬雄给他立个定义说：“通天，地，人，曰儒。”（《法言·君子篇》）最初的儒——术士——都是知天文，识旱潦底，他底职分近于巫祝，能以乐舞降神。他是巫官，是乐官，又是教官，《虞书》载舜命夔典乐教胄子，以谐神人，即是此意。其后衍为司乐之官，“掌成均之法，以治建国之学政，使有道有德者教国之子弟，死则为乐祖，祭于瞽宗”。（《周礼·大同乐文》）儒者皆以诲人为职志，其渊源未必不在此。怎么说最先他也不过是巫觋瞽蒙一流人呢？古人以衣冠为章身序官之具，因其形式辨别那人底职分，儒者所戴底帽子名“术氏冠”，又名“圜冠”，圜冠是以鹖（翠鸟）羽装饰底帽子，用来舞旱暵求雨底。《庄子·田子方》有一段话说，“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；履句屨者知地形；缓佩决者事至而断”。可见周代底儒，虽不必尽为舞师之事，而他底衣冠仍然存著先代底制度，使人一见就可以理会他是“通天地人底人”。（参看章太炎《国故论衡·原儒》。）又《诗传》所谓“建邦能命龟；田能施命；作器能铭；使能造命；登高能赋；师旅能誓；山川能说；丧纪能诔；祭祀能语；君子能此九者，可谓有德音，可以为大夫”。这九能中，巫祝之事占了一大半，然而不失其为大夫，君子。

儒者既为术士的统称，所以凡有一技一艺之长对于所事能够明了，熟练，和有法术能教人底都可以称为儒，儒为术士。故“教之以事，而

谕诸德者”为师（《文王世子》文），“有六艺以教民者”为保，保就是儒。“艺”，“术”，“道”三字，在典籍中几成为儒者底专卖品。《天官·大宰职》说“儒以道得民”；《地官·保氏职》说“养国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艺”。这里底“道”，是技术材艺底道。《晏子春秋·内篇》第五说，“燕之游士，有泯子午者，南见晏子于齐，言有文章，术有条理，巨可以补国，细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”。又《吕氏春秋·博志》，“孔，墨，宁越，皆布衣之士也，虑于天下，以为无若先王之术者”。我们可以看出泯子午所有底是补国益身底法术；孔，墨，宁越所学底是先王底经术。“法术”“经术”都是儒者底职志，是圣人所务底。《礼记·乡饮酒义》说：“古之学术道者，将以得身也，是故圣人，务焉。”“术道”就是艺术。到这里，我们不能不略讲一点“艺”底意思。

保氏所教底是艺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：“古之儒者，博学庶六艺之文。六艺者，王教之典籍，先圣所以明天道，正人伦，致至治之成法也。”明六艺是先圣致治底道术，是世儒所习所教底。六艺是政教学艺底基础，自来就有今文古文两派说法。主这说底为“纯乎明理”为今文六艺；“兼详纪事”为古文六艺。此外还有保氏所教底六艺——礼，乐，射，御，书，数。《大戴礼》有“小艺”“大艺”底分别，故此，我以为六艺可以分为小学六艺和大学六艺。小学六艺是小艺，就是童子八岁出外就舍所学底，五礼，六乐，五射，五驭，六书，九数。大学六艺是大艺，即所谓六经，是束发时在大学所学底，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。不过大学所习底大艺古时只有四样，《王制》：

乐正崇四术，立四教，顺先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，
以造士。

《庄子·天下篇》也说：

古之人其备乎！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万物，和天下，泽及百姓，明于本数，系于末度。六通，四辟，大小精粗，其运无乎不在。其明而在数度者，旧法世传之，史尚多有之。其在于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者，邹鲁之士，缙绅先生多能明之。《诗》以道志；《书》以道事；《礼》以道行；《乐》以道和；《易》以道阴阳；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，百家之学，时或称而道之。

这里明明有大小艺的分别，“其明在数度”即是先圣遗留下来，揖让，升降；舞勺，诵诗；白矢，连参；谐声，转注；鸣鸾，逐禽；均输，方程，等等技艺底成法，所谓“六通”，是通于此；世人所传，也是传此。至于载于竹帛底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，是古圣政事，典章，学术，名理之所从出，要辟这四艺非入大学不成，故只为邹鲁一部分底士，和缙绅先生所能明。道阴阳底《易》，和道名分底《春秋》，本不在《大学》六艺之列，也许因为这两样是卜史所专掌，需要在官然后学习底缘故。韩宣子观书于鲁大史氏，见《易·象》与《鲁春秋》。（见《左昭公二年传》。这时孔子十一岁。）孔子晚年才学《易》，删定《春秋》，足见这两书不藏于簧宫，孔子在大成之年也未必猎涉过底。

凡是一种理想，都是由许多成法挤出来底。六艺既是先王经世底成迹，那钻研经术底儒生在习诵之余，必要揣摩其中的道理。于是在六艺中抽出一个经纬天下底“道”，而“道”“艺”底判别，就越来越远了。这个“道”是从六经产出，是九流百家所同宗底。所以不习六艺所产底“道术”观念就不能观九家之言，便不能明白儒家底渊源。百家所持，原来只有从六艺产出底一个“道”字，这个“道”本不专为一家，乃是一个玄名，自刘向以后，始以老庄之说为道家，《汉志》说“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”，其实古代神政，能诵习典册底，也只有祝史之流，正不必到衰周王官失守，然后流为一家之言。且在官者皆习六艺，各家底思

惟也是趋于大同，也是“违道不远”底。

“道”是什么意思呢？说起来，又是一篇大文章，我只能将他底大意提些出来和儒家所主底比较一下而已。道只是宇宙间惟一不易的根源，是无量事物之所从出底。《韩非·解老篇》，“道者，万物之所然也；万理之所稽也”。《庄子·天下篇》说，“古之所谓道术者，果恶乎在？曰无乎不在”。又《在宥篇》说“一而不可不易者，道也”。《中庸》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。《易》说，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。又说“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。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”。这阴阳，柔刚，仁义之道，是一般术士所传习底。所以道家主柔弱，说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，而“儒”训为“柔”。道主“无为”，而孔子说“无为而治天下其舜也欤？夫何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”。道推原于天，如《天道篇》说：“古之明大道者，先明天，而道德次之。道德已明，而美次之。……以此事上，以此畜下，以此治物，以此修身。知谋不用，必归于天，此之谓太平，治之至也。”而儒以顺阴阳为职志，故《祭义》说，“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，立以为易。易抱龟南面，天子卷冕北面，虽有明知之心，必断其志焉，示不敢专，以尊天也”。《易》是中国最古的书，是六艺之祖，百家，尤其以道家底思想都从这里出发底。孔子所修底道，多在实用方面，故说“修道以俟天下”。而他底行教目的也是要和这经纬六合之“道”同流底。看他所说“吾道一以贯”和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，四个大教义，也可以理会得道儒之分别。

我们既然知道，“艺”，“术”，“道”，是一般儒士所常道底，儒不过是学道人底名称，而后人多以儒为宗师仲尼底人。这是因为孔子和他底门人自己认定他们是儒底正友，是以道艺教乡里底。孔子对子夏说“女为‘君子儒’；无为‘小人儒’”。因为子夏当时设教，夫子告以儒之道，教他要做识大体而可大受底“君子儒”。此后社会上就把儒这个字来做学“孔子道”底人底专名。（见《淮南·俶真训》“儒墨”注）

原来在孔子以后不久，这字底意义就狭窄了。孟子自己说他底道理是儒，而墨者夷子亦称孟子所传为“儒者之道”。（参见《滕文公上》《尽心下》）儒既成为学“孔子道”底专名，所以《汉志》说，“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，助人君顺阴阳，明教化者也。游文于六经之中，留意于仁义之际。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，以重其言。于道为最高”。又应劭《风俗通》说“儒，区也。言其区别古今，居则玩圣哲之词，动则行典籍之道。稽先王之制，立当时之事，此通儒也。若能纳而不能出，能言而不能行，讲诵而已，无能往来，此俗儒也”。训儒为“区”，明其对于道与诸家有不同的地方。这和犹太教中一部分持律底人自以为“法利赛”底意思相仿。至于“通儒”，“俗儒”，仍是孔子“君子儒”，“小人儒”底意思。

儒这个名字，怎样到孔子以后就变为一种特殊的教义呢？这有三个缘故。

一，当时社会底光景，使他成为一家之说。要知道孔子正生于“天下无道”底时代，他对于当时的人民要积极地思想和行为方面去救度他们。他对于邪说，横议，要用“正名”底方法去矫正。要为他们立一个是非底标准，故因鲁史而寄他“正分名”，“寓褒贬”底大意思。孟子发明孔子作《春秋》底意思说“孔子成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”。又说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。《诗》亡，然后《春秋》作。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梲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一也。其事则齐桓，晋文；其文则史。孔子曰，‘其义，则丘窃取之矣’”。孔子用这个方法，本来是很好，因为人都愿意留个好名声在史册上，若个人的善恶行为在史册上都有一定的书法，实在可以使“乱臣贼子惧”。我见这个比舆论更有势力。

二，他要实行他师儒之职，以道德教人。道德不是空洞的，是要举出些人来做榜样底。所以他所立底标准人物是古代的“圣人”，“君子”。他要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，可见还是行着师保之职，只以先圣底道艺教人。《汉志》说儒家盖出于司徒之官，这“盖”字用得很好，因为

儒者都以教学为职志，如司徒底属官一般，儒者既是“游文于六经之中，留意于仁义之际”，故凡事必师古；从典籍上传来底成法，都要学底。“子所雅言；诗，书，艺，礼。”为重先王之典训，故“正言其音”，也是为学底方法。

三，他对于政教底理想是偏重“书”的。胡适说孔子对于改良社会国家底下方法全在一部《易经》。但“《易》的思想”，是士君子意识中所共有；在百家中没有一家不归根于《易》底。我以为儒所以能成为一家；是出于孔子底“书的意思”。就是他所解说底《易经》也是本着这个去解释底。《尚书》即所谓古昔圣贤底典型，孔子说到政事或他的理想底时候，少有不引他来做佐证，或摄取其中的意思说出来。

（甲）孔子第一个理想是“孝友”，看《为政》载：

或谓孔子曰，“子奚不为政？”

子曰：“书云，‘孝乎惟孝！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’。（《逸书》。东晋伪古文采入君陈。）是亦为政。奚其为为政？”

孔子这段《逸书》，意思说政治的根本是在“孝于父母，友于兄弟”。因为孝友是齐家底要政，孝弟既“不好犯上”，那也就“不好作乱”了。所以孝弟之道明，则天下后世底“乱臣贼子”无所养成。

孔子底孝说，也是托于《尚书》底。孝是儒教底重要教义，也是入儒教团体（做圣人之徒）底人所当履行底。儒者看父母像天神一般地不可侵犯，在生时固然要尽孝尽敬，死后也不许你一下就把他们搬在脑后，要终身追慕他们——形式上要行三年底丧服。这三年丧服底观念也是出于《尚书》底。《说命》载“王宅夏，亮阴三祀。既免丧，其惟弗言”。引起子张底问（文在《宪问》）。以后孟子更伸引《尧典》“二十人载，放勋乃徂落，百姓如丧考妣。三年，四海遏蜜八音”（见《万章》，原文今入《舜典》）。伏生《尚书》原只《尧典》一篇，无“粤若

稽古帝舜”二十字，至齐建武年始误分为二篇）底话，历说舜禹，行三年之丧底事实。

三年之丧是否儒家“托古改制”底一例，自来就是一个疑问。毛奇龄《臚言》有一段很可以帮助我们。

滕文公问孟子，始定为三年之丧，岂战国诸侯皆不行三年之丧乎？若然，则齐宣欲短丧，何欤？然且曰吾宗国鲁先君亦不行，吾先君亦不行，则是鲁周公伯禽，滕叔绣并无一行三年之丧者。往读《论语·子张问》高宗三年不言，夫子曰“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”，遂疑子张此问，夫子此答，其周制当无此事可知。何则？子张以高宗为创见，而夫子又言“古之人”，其非今制昭然也。及读《周书·康王之诰》，成王崩，方九日，康王遂即位，冕服出命令诰诸侯，与“三年不言”绝不相同。然犹曰，此天子事耳。后读《春秋传》晋平公初即位，改服命官，而通列国盟戒之事，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丧，引“三年不言”为训，而滕文奉行。即又曰“五月居庐，未有命戒”，是皆商以前之制，并非周制。周公所制礼，并未有此，故侃侃然曰，周公不行，叔绣不行，悖先祖，违授受，历历有辞，而世读其书，而通不察也。盖其云“定三年之丧”，谓定三年之丧制也。然则，孟子何以使行商制？曰，使滕行助法，亦商制也。

看来，“三年之丧”是儒家“好古敏求”底事实，大概古来只行于王侯辈，不过儒家把他推行到士庶身上，为底要“民德归厚”罢了。

（乙）孔子第二个理想是“法天”。《泰伯》载：夫子赞美尧底话说：“大哉，尧之为君也，巍巍乎，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”这是发明《尧典》“乃命羲和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时”底意思。以后他在《易·系词》上说，“古者，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；